

余雪曼教授印象

许统义

余雪曼教授是四川重庆人。1956年1月受聘为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。两年后卸下系主任职务而为专任教授。1959年末第一届同学结业，余教授辞职回香港，继续主持雪曼艺文院，专事中国诗文书画的教研工作。四十年来在日本、美国、台湾及中国大陆各大城市举行个人诗文书画展览，颇获好评。这期间余教授陆续出版多种创作，其中以兰亭序帖的研究各书最受海峡两岸三地学者普遍接受。奉为习字的定本。几年前，余教授献出大部份作品，由重庆市设立专馆陈列，以供大众欣赏。

1997年余教授病逝于香港，享年九十岁。

余教授四十年前离开南大，可说是功成身退。其后，他曾到马来西亚举行个展。几年前听说他有意到星洲再开一次义展（1957年他曾为南大贫苦同学开过一次义展，筹募助学金）。后因他已将大部份作品捐献重庆市，须派专人商借，并购巨额保险，以及支付随行人员费用等等，手续烦什而且所须经费庞大，只好作罢。余教授来星之举，亦因而未能成行，大家也就失去了重聚的最后机会。

现在事隔四十年了，我对余老师的印象只能是片面的，也是片断的。一切人与事也让时间淘洗得完全模糊不

清了。有点像旧录像带，重映时不仅失焦、也失色、失明、失光彩。更糟的，所用的放映机又老又旧又过时，这样的效果可想而知，绝对是清晰不了，有点印象就已经不错了。诸君若有心理准备，当然不会过份要求。现在就让我因陋就简，想到就说，谈谈我对余老师的一些不完整的印象。

余老师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应是深刻的。一方面因是师生关系，四年课堂上经常相对而视。另一方面，余师艺文院所出版的书刊，大都有他本人的照片，这点给人（最少给我）印象特别深，当时一般华文书刊少有这么作的。倒是各地一些中药都常有“提防假冒，请认主人真像”的字样，所以初见余师的出版物附有真像，都特感新鲜。尤其是当时报章每日都登中医师王某某的广告，更容易让同学引为笑谈。

其实余师出版物附作者头像的做法，回想起来倒不失为一项创新，走在时代前头。反观今日几乎所有华文书都有作者头像和简介。

南洋大学在1956年3月15日开学，接着中文系同学上第一节课，由余老师亲自教国文。第一堂课讲唐人张若虚的“春江花月夜”，一首非常优美的长诗。当时余师所编的“南洋大学基本国文”似乎尚未运到；先发油印讲义。印象有两点特别深刻。第一点是余师的仪表：四十多五十岁，皮肤白皙，高高瘦瘦的个子，满头黑发颇长，深度近视的金丝眼镜；平常只见两片圆亮玻璃，可是当他突然对准你时，却有点像金鱼的大泡眼，游近鱼缸瞪着你一

样。白色长袖衬衫、杏黄色长裤、白裤带，黑白相间的革履。走路时，轻飘飘的踩着碎步，身体稍微摆动；远远看去，颇有点像古美人画像：头大、肩细，身段摇曳多姿。后来当余师讲授洛神赋，读到“凌波微步”时，我差点没笑出来，这不是一个大好的写照吗？不久，又有一个强烈的对照，潘重规教授来了。二人的外貌、声音和步履，恰恰相反：潘师纯属阳刚豪放，而余师则是阴柔婉约的。也许是天生性格的关系，余师似乎特别锺意婉约词，他的画作也常用婉约词意为题材。在我印象中，他有一幅画是以柳永“八声甘州”名词“天际识归舟”为题。

余师讲书时调门特别高，四川口音也特别重，初听很不习惯，却被他那声调的抑扬顿挫，节奏的徐疾起伏所吸引。余师的的确确把中国传统诗词的音律美充分表达出来，让听者真正体味到这美的存在，因而生出爱读、爱看的欲望。

虽然传统诗词讲究四声，余师的四川口音朗读起来，就缺了入声；似乎都把入声字转为阴平或去声；把凄切的悲秋词，都加入了如怨如诉的情调，听来别是一番滋味。这对我们这些来自八声方言群的学生来说，称得上是多开了一个生面，多体味传统诗词的隽永的一面。也许唐宋以来诗词正是用近似四川口音的语言创作出来的，得用川音才能真正体会其佳妙。无论如何，听余师朗读传统诗词确是一种享受，值得回味。

余师讲课很注重板书，每堂课开始时，他都郑重其事的用他独创的莲体行书，大片大片的抄满黑板（其实是青

色的)，看他异常认真的点横撇捺的书法表演，也是一种享受。有时看多了难免技痒，在抄笔记时不妨学他的字样，日子一久，就成了仿莲体。同学当中确有其人，不仅学到莲体，也学到多作板书的教学法，终身受用不浅。有时看腻了，注意力难免被他后脑几处头发稀疏的地方所吸引。原来余师的头发并不浓密，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秃脱；过些时候，还发现一些灰白色的发根，或许有些老态了……

中文系一年级课程中有“中国书法”，两个学分，一学期每周二节。由余师亲授。在我印象中，余师特别推崇书圣王羲之，尤其是王氏的兰亭集序帖，他用好几节课专讲‘永’字八法，介绍大家买他所编著的兰亭集序帖。当时有些同学开始认真临习，也有只是敷衍了事。后来才知道余师这本字帖已成为海峡两岸三地学生王帖的权威著作，至今仍为学者乐用。余师也介绍他自创的莲体（余师字莲裔，故以莲名所创书体）。莲体看来婀娜多姿，我总觉得它颇有摇曳生姿的态势，如果称为柳（叶）体，或者更传神。不过自余师离开南大后，经过多年专意开发，特别是余师在莲体中注入禅的机心，让莲体书法充分发挥禅的意境。从七十年代出版的余师书画集看来，莲体书法已进入成熟阶段，已经获得中日众书家的赞赏。

余师在我印象中似乎不苟言笑，上课时偶尔提及有趣的事情，充其量只见他稍绽笑容，可是那笑很快就休止。好像从来就没见过他大笑一次，也没看过他真正高兴起来的样子。这点也跟潘师的开朗成对照。因此，这个印象也

很深刻。也许正是这样，我总觉得余师不容易亲近。我想其他男同学也有相同的感觉。至于女同学的感觉怎么样，我就不清楚了。

在我记忆当中，那四年里，除了课堂听课外，我与余师只有两次短短的接触。一次在1956年上学期，大概是彗星飞过星洲上空前后的一个夜晚，我独个上校长岗散步，巧遇余师与潘师也散步到校长岗。招呼过后，我好奇的问他二位，中国古书上可有彗星出现的记录。二师随口说出好几处，两人好像在比赛背书一样，此起彼落不断背诵，让我应接不暇，而且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古书名字。我顿时呆住了，简直不知所措，完全被二师的渊博学识所镇住。记得余师初次提到潘师将参加中文系教师阵容时，曾说过他两人在中央大学（前身为东南大学）虽属同班同学，潘师为黄季刚大师的入室弟子，音韵训诂和经学的根基雄厚。言外大有自叹不如之意。这时听二师谈到彗星时博引古籍的情况，才知那是余师的自谦。事实上，余师的古典根基也是雄厚的。

再一次会见在1958年间，某日下午突然接到余师的条子，要我和先荣同学一道上山到他的寓舍见他。当时，余师已卸下系主任职务，专心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，是必修科，甲乙班同学一齐在大讲堂上课。有几位男同学因某些事故对余师有意见，故意当他转身板书时做出各种怪声，破坏课堂秩序，大大影响听课的情绪。因此，我便常缺课，宁可躲在宿舍里看书自修。这次接到余师召见的字条，颇感意外。会见之时，果然余师问起讲堂怪声的事，

我只能实说不知道。会谈很快就结束了。在我辞去之前，他即席写了一个便条，叫我传给有关同学。我当面看他执毛笔写便条，印象深刻。原来他握笔枕腕书写行书时，全靠手指的灵活运动。那情景，使我眼前一亮。原来书写莲体行书时，枕腕而书是一诀窍。先把执笔的手腕固定下来，然后灵活的运动执笔的手指作上、下而右倾的笔划。大抵是这个原故，莲体字的直笔常作右倾的姿态，结果就常出现上尖下尖的柳叶形状。虽然余师当时只是不经意的写个便条，却给我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有个想法，要学书法，最贵观摩；要多看书家写字，看他如何执笔；如何运腕、运指；同时他如何运转笔锋，包括各种顿按徐疾等动作。唯有这样才能掌握书法的妙诀。

南大中文系当时的教授阵容最强，而且都能写好字。除了余师，潘师、涂公遂师、刘太希师和凌叔华师都擅长书法，而且各有千秋。可惜我不肯启口乞讨，四年里都没拿到任何墨宝。倒是在十五年前一次偶然机遇：让我有幸得到刘师晚年墨宝一件。1984年我因公到台湾去，在一个画廊茶室里与刘师重逢。隔天他着人送一横幅到我下榻的旅社给我，写的是他那晚为我作的近体诗三首，自署“八十八老人”。诗和书都属上乘，毫无老态。真可惜，我却没有机会与余师重逢，没能得到八十八余师的莲体墨宝。

在那相聚的四年里，我究竟有没有给余师留下一个印象，这很难说，也很难知道。不过，我想印象是好是坏，总是有的。记得有一次大考过后，我到邹达助教住处聊

天。不知道怎样谈起，他说余师已经回去香港了，他的考卷照例由助教打分。不过余师临走照常抽阅四份，亲自打分以供助教参考，其中有我的卷子和另一位女同学的。我的打少五分，邹助教解释原因；余师说我多选现语系科目，常得好分数，这边分数低一点，也可平衡一下。由此可见余师对我还是有印象的。或者就因为邹助教这番传话，促使我毕业后决定不靠中文专业谋生。四十年来，我总把中文中国传统学问当成个人修养的基础，把诗词书画作为业余怡养性灵的无上享受。这样可让日子过得比较闲适、比较洒脱。真是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例，我一生受用不浅也。

四十年一瞬即过，我已届从心所欲之年了。人一入老年便时不时记起往年的旧事，却又常常记得不完全，都是零星杂碎，随便牵扯一大堆；就像“加浓牛乳”（捡破烂者）一样；记下来的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。把这当作文章，总觉得有点勉强，很不惬意。似应完全丢掉从头再来。不过这谈何容易，重来还不是老样子，那里能够记得更周全。现在就算挂一漏万，只好由它去了。